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张之洞刘坤一

诗文选译

● 戴显群 林庆元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张之洞刘坤一
诗文选译

戴显群 林庆元

巴蜀书社 中国 成都

责任编辑：李 蓓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张之洞刘坤一诗文选译

戴显群 林庆元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1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凜凜”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鹜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张之洞、刘坤一都是清朝末年的封疆大吏和近代著名的洋务派领袖人物。他们对清末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影响。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张之洞四岁入塾，十岁时作诗文能“援笔立就”，享有“神童”之誉。其后曾师从胡林翼、韩超。同治二年（1863）中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正式步入仕途。同治六年（1867），张之洞奉旨主持浙江乡试。其后升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度过了近十载的外省学官生涯。他所到之处，均以提倡实学、倡导学术为己任。任四川学政期间，曾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对读书人导以门径，其学术价值为旧学者所普遍重视。光绪三年（1877）初，张之洞回到京城。他因敢于议论朝政，针砭时弊，抨击权贵，成为当时清流派的重要成员，在朝野上下获得显赫名声。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补授山西巡抚，从此迈入封疆大吏的门槛。

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开始兴办一系列洋务项目。后因中法战争，于光绪十年（1884）春调署两广总督。张之洞是坚决的主战派，起用老将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战后，又在广东设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立书院，武备文事并举。如果说出任山西巡抚是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化的开端，那么，两广总督任内，历史已正式将他推上洋务大吏的位置。

光绪十五年（1889）末，张之洞调署两湖总督，其后曾两次暂署两江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入军机处。这一段时间，张之洞全面展开其洋务事业，成为洋务派晚期的重要代表。尤其是他惨淡经营的“湖北新政”，更是耸动朝野视听，清末各省推行“新政”，多取法湖北。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力主抗战。《马关条约》签订后，他痛心疾首，连上奏章，历陈利害，并支持台湾军民抗日斗争。由于他的主战言行以及新政名声，使之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康、梁等维新人物更是对他寄寓厚望，他也曾一度靠拢维新党。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发展，一贯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对变法运动的态度愈益不协调。同时，老练圆滑的张之洞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坚决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从“预为自保”计，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4月撰《劝学篇》四万余言。全书贯穿的论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技术。这部书是洋务派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张之洞力主剿灭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并饬各省督抚“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但张之洞坚决反对同列强开战，在列强策动下，与两江

总督刘坤一联合东南各督抚，创“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使清王朝几乎倾覆。为挽救统治危机，清廷于1901年1月下“变法诏”，表示朝廷要力图振作，实行“新政”。6—7月间，张之洞、刘坤一作为“参预政务大臣”合奏“变法三疏”，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博得朝廷的赞许，以后几年里，清政府的“新政”大部分以此为蓝本。

张之洞补授军机大臣后，开始跻身清廷最高决策阶层，但此时清王朝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年迈的张之洞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为挽救清王朝的崩溃使出浑身解数，如调和满汉之争，襄赞立宪，维护铁路国有等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刘坤一（1830—1902）字岷庄，湖南新宁人。十七岁入县学补廪膳生，博闻强记，潜心研究经世之学。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攻打湖南，刘坤一随湘南的楚勇出境攻打太平军，从此投身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湘军队伍中，此后十年中一直没有离开这支队伍。而他也就以一名秀才，累经保举，由教谕、知县、知州、知府、道员、广东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到同治四年（1865）遂跻身江西巡抚这一封疆大吏的地位。这十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统率勇营从事镇压太平军和天地会，实际上没有搞多少文职行政工作。在任江西巡抚的九年间，他仍积极参与了镇压太平军余部和农民起义。可以说是用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顶子。

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刘坤一奉命署理两江总督。次年八月，又奉命调补两广总督。当时，左宗棠正准备出关收复新疆失地，而李鸿章却大倡海防之议，朝廷内外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刘坤一积极支持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失地的主张。

光绪五年（1879），刘坤一再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不久，中俄两国因伊犁交涉而关系日趋紧张。刘坤一上书清廷，建议加强防务，主张暂缓对崇厚的处置，让英国人从中调解。当时，清流派大多数官员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态度，坚持废约，严惩崇厚。光绪七年（1881）六月，刘坤一遭清流派张之洞等人的弹劾而开缺回籍，在家赋闲达九年之久。

在刘坤一赋闲家居的这段时间里，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内外交困，不得不起用湘、淮两系重要首领以支撑危局。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清廷第三次任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并帮办海军事务。此时，湘军大头目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先后去世，他成了湘军中资望最高的人，他的声势已迥异于十年之前，因此清廷才对他刮目相待。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以淮军为主的清朝军队在作战中节节败退，战火很快烧到我国的辽东半岛，清统治阶级大为震动。此时，一部分主战派官员主张抽调湘军以挽回败局。于是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驻节山海关，督办关内外军务。结果，日军接连攻陷牛庄、营口、田庄台，湘军也全线溃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刘坤一非常气愤，支持台湾刘永福的抗日斗争，奏请联合俄国以抗拒日本。中日战争结束后，刘坤一重返两江总督任上，此时李鸿章已经失势，淮系军阀再也无法与刘坤一抗衡了，刘坤一在清朝督抚中的地位已显得更加重要。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成了长江流域的实力派，清廷和在这一带有利害关系的各国都对他另眼看待。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进犯中国。当北方炮火连天的时候，刘坤一凭借自己的威信，不顾清廷号令，联合张之洞等东

南各督抚创“东南互保”。在缔结辛丑和约过程中，沙俄想趁火打劫，暗中强迫清廷订立密约。李鸿章主张答应沙俄要求，而刘坤一则极力反对，建言各国出面干涉，结果沙俄的计谋成了泡影。在清廷推行的所谓“新政”时期，他与张之洞等也参与其事。当时的王公大臣、地方督抚均条陈上书，献计献策，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的“江楚会奏三折”最为著名。不久刘坤一就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

张之洞作为一个“翰苑词彦”出身，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文官，擅长属文作诗，留下三百多万字的著作《张文襄公全集》。刘坤一由诸生起家军旅，也留下了约二百五十万字的著作《刘忠诚公遗集》。张、刘二人均为清朝末年的国家重臣，数十年来镇抚地方，办理洋务，处理交涉，参与军机，所以他们著作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奏议、电奏、公牍、电信、书札、论说、杂记、诗歌等，张之洞还留下一些学术论著，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

张之洞与刘坤一是同一时代的人，所处的政治地位也基本相似，所以他们著作的思想特色亦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济世和变通思想。 经世致用、变通求强是清代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一个共同思想特征。张之洞少年时期曾师从胡林翼、韩超，他的史学、经济之学的功底，主要得益于胡韩二人。刘坤一在青年时代也是潜心研究经世之学。他们踏上仕途后，目睹外夷入侵，社会腐败落后，国家动荡不安，心中必然产生了要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因而，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浓厚的济世、用世与变通思想。张之洞《劝学篇》一以贯之的论

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篇文章强调“体”和“用”的关系，显然区别于墨守陈规的顽固派。这部书是洋务派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其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经世致用。作为国家的重臣，张之洞、刘坤一经常上书言事，他们或是指陈朝政，或是针砭时弊，或是办理洋务，或是献计献策。从这些奏议、电奏、公牍以及一些书札等文章中也都充分反映出济世与变通的思想要求。最著名的如清廷推行“新政”时期，张刘二人合奏的“江楚会奏三折”。折中提出了兴学育才、变通中法、兼采西法等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变革主张。

二是防夷与制夷思想。张之洞、刘坤一著作中还有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防夷”和“制夷”。张、刘二人区别于地主阶级顽固派盲目排外思想和妥协派退让丧权的行为。作为洋务派领袖人物，他们主张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反对闭关自守。但在收复新疆失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他们都是坚决的主战派。刘坤一的《论东瀛事》，不仅谴责日本吞并琉球，而且还谋求策略以防范，制止日本的侵略野心。中法战争爆发了，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老将冯子材抗法，并连上奏折要求加强闽广、台湾等地的边海防。《马关条约》签订后，刘坤一上《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折》。张之洞也连上奏章，历陈利害。对于张、刘等人所创“东南互保”，表面上看是与列强相勾结，但在中外两方力量悬殊情况下，“东南互保”使得半壁河山免受战乱的祸害和侵略者的蹂躏。此外，张、刘的著作中，有关对外交涉、练兵和海防、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反对中俄密约等方面的内容相当多。

三是维护封建纲纪的思想。作为封建官僚士大夫阶层，张、刘等人都是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这使他们对一切违背封建纲纪的言行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其典型的代表作。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坚持纲常名教的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技术。对刘坤一来说，这种思想更表现为他对清王朝的忠心耿耿和对农民起义军的残酷镇压。即便是在受嫌开缺回籍时，他仍旧表现出效忠清王朝的思想，在《金陵留别》诗中写到：“敢因惹苒明丹悃”、“愧无庶富答皇仁”。刘坤一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他的遗集中各类文章几乎都有镇压太平军和天地会的内容。比较张之洞而言，刘坤一忠于封建王朝、维护纲纪道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是恤民思想。张之洞、刘坤一不是那种不谙民生疾苦，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昏官，而是有一定“民本”思想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们的诗文或多或少也流露出忧国忧民情感和恤民思想。他们的奏疏中，有一些是要求清政府出面交涉以保护海外华侨免遭当地政府和刁民的欺凌。从中也反映出他们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意愿。

张之洞、刘坤一著作的艺术特色，应将文章与诗歌分别论述。

张之洞的文名应盛于刘坤一，但张、刘二人文章的艺术特色还是有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议论畅达，气势恢宏。善于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以有力的论据，把道理阐述得淋漓尽致，其中张之洞的《劝学篇》最为典型。二是旁征博引，论据翔实。他们的文章都喜欢谈古论今，引用历史典故来佐证所要表达的道理，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们还善于借鉴外国的经验来说明

自己的论点，增加了文章的现实感。三是语言雅正朴素，自然流畅。四是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劝学篇》四万余言，《江楚会奏三折》也上万言，如此长篇论说，千头万绪，但作者巧妙安排，妥为处理，线条非常清楚。不过，张之洞在这几点上都比刘坤一表现得更为突出。

此外，张之洞的三部学术著作——《輶轩语》、《书目答问》和《劝学篇》对晚清学术界也有很大的影响。

清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个繁荣时代。清诗之多，则是任何朝代所不及的，而且清诗流派众多，有它独具的特色。单就张、刘生活的晚清时期，有提倡汉魏六朝和盛唐的湖湘派，有提倡南北宋的宋诗派，稍后有“同光体”诗人，有崇尚李商隐的西昆派，有兼采唐宋的一派，还有诗界革命派。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兼采唐宋一派，因张是封疆大吏，颇引人注目。张之洞著有《广雅堂诗集》四卷。其论诗主张融“宋意入唐格”，称江西诗派为“魔派”，而又称“北宋清奇是雅音”。他作诗宏肆典雅，不尚高古奇崛，也不落平易肤浅之习。在艺术性方面，虽也多有创新，但作为一名封疆大吏兼诗人，其诗作中一部分自不能说是十分工巧的。因此，《广雅堂诗集》也终不能有较高的地位。

相较之下，刘坤一的诗歌更无法与张之洞相比。刘坤一著有《补过斋诗集》二卷，在艺术性方面难有创新，谈不上什么特色。诗作中的一部分还流于平易肤浅。

张之洞、刘坤一作为封建官僚，他们的诗毫无疑问有着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思想性并不高。他们的“诗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比不上他们的“文名”。

兹书选译了张之洞、刘坤一的部分诗文作品，以飨青年读者。其中《劝学篇》（六篇）的点注曾参考了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一书，特此说明。